

Y 893449

分类号_____

单位代码 10697

密 级_____

学 号 20032359

西 北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题目 20 世纪运城盐业变迁研究

作者 杨 彩 丹

指导教师 岳 琰 专业技术职务 教 授

学科(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

答辩日期 2006 年 6 月 学位授予日期_____

二〇〇六年五月

中文摘要

运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盐务专城。20 世纪运城盐业经历了清末不平等条约与运城盐业、丁恩“盐务改革”前后的运城盐业、日寇与地方军阀对运城盐业的掠损和新中国运城盐业的发展。

百年盐业的发展对运城地方社会的经济、公益事业及教育文化事业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盐池税收构成了 20 世纪运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业经济也带动了运城多种产业的发展。同时，庙会经济丰富了运城人民的经济生活；清末运城社会慈善机构的兴办即得力于盐商的经济资助。新中国运城盐化局以及后来的南风集团对运城地方福利机构的创办以及灾害救济、困难户救济、五保户救济做出了重要贡献；20 世纪初运城教育由运学向较为完备的初级、中级教育体系转变。新中国建立后，运城盐化局进行企业办学，推动了运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运城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

20 世纪运城盐业的发展趋势，即“以食盐为主”传统生产观念的淡化；单一食盐生产到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建立；运城盐池资源利用方式的不断调整和优化。

关键词： 运城盐业 丁恩“盐务改革” 南风集团
“盐池资源”特色旅游业

Abstract

YunCheng is the only special salt routine city in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YunCheng's salt industry had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unequal treaty and YunCheng's salt industry; YunCheng salt industry round about DingEn's reform; Japanese and Chinese warlord robbed of YunCheng salt pond; the development of YunCheng salt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alt industry ha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YunCheng's economy, social public services, education and cultural undertakings. The salt tax revenue was the major source of YunCheng's revenue. The salt industry also promoted the other industries in YunCheng. Temple fair economy enriched people's lives in YunCheng; The salt businessmen subsidized YunCheng's charities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unCheng's salt office and NaFeng group corporation was the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social public services;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YunXue transformed into a system including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unCheng's salt office set up its own schools, which promoted YunCheng's education. YunCheng also formed the culture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YunCheng's salt industry had three trends: the traditional idea that "salt is dominated" became dim; The production of the table salt turning to the pluralistic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way of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was adjusted and optimized.

Keyword: YunCheng's salt industry; DingEn's salt routine reform ; NaFeng group corporation; Tourist industry with "salt pond resources" characteristics ;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即：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工作的知识产权单位属于西北大学。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本人保证，毕业后结合学位论文研究课题再撰写的文章一律注明作者单位为西北大学。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杨彩丹 指导教师签名：岳环

2006年5月8日

06年6月3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杨彩丹
2006年5月

绪 论

（一）关于 20 世纪运城盐业变迁的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盐业史的研究，近代以前多是从“盐法”和“盐政”的角度出发，着眼于对盐务和盐税的整顿和完善。以清代运城盐池研究为例，主要著作有以下几部：江人镜、张元鼎的《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冯达道的《新修河东运司志》、苏贞昌的《河东盐政汇纂》、沈业富的《河东盐法调剂记》、朱一凤的《敕修河东盐法志》等，都是以评说“盐政”或“盐法”的得失为主。如朱一凤的《敕修河东盐法志》，全书共 26 目，其中就有 19 目专论运城盐池，与前四部书相比，它更加详细地考察了运城盐业的管理体制、经营体制、行销幅员、禁稽令甲、税制法令等方面。

近代以来，迫于时局，全国的盐业研究陷入低潮。有关运城盐池的研究也散见于一些通论性的盐业专著中，如田斌《中国盐税与盐政》、林振翰《中国盐政纪要》、欧宗佑《中国盐政小史》、曾仰丰的《中国盐政史》，这些著作的内容多集中在征税制度、专卖政策、私盐问题、生产管理和运销制度等问题上，依然把重心放在盐政、盐法上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盐业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批通史性的盐业专著：何维凝的《中国盐政史》、田秋野、周维亮的《中华盐业史》、唐仁粤主编的《中国盐业史》，钟长永的《中国盐业历史》和林建宇的《中国盐业经济》等。同时，区域性研究逐渐开展，如《柴达木盆地盐湖》、《西藏盐湖》、《内蒙古盐湖》、《青海盐湖》以及郑喜玉的《中国盐湖志》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研文摆脱了单纯的评价盐法、盐政的制度史的研究框架，走向多元化。比如，钟长永的《中国盐业历史》就对盐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尤为关注，他对中国古代钻井技术和四川盐业股份制形式的变化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而林建宇的《中国盐业经济》则运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线索，对中国盐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盐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至于地域研究方面，如郑喜玉的《中国盐湖志》，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各盐湖的地学、化工（包括对盐湖矿床、水文地质、矿物学、分离提取技术和加工工艺等）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后，运城盐业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新的成果。柴继光教授的《运城盐池研究》对中国古代历史上运城盐池的幅员、神话传说、古代食盐生产方式的演进、盐务机构的沿革、盐池诗歌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他的另一部著作《晋盐文化述要》则主要从古代文化史的角度入手，对由运城盐业经济辐射而形成的古代城市建设、水利建设、文化教育事业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则是中共晋南地委组织编写的《银湖春光》，该书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记述了运城盐池从盐池的形成、早期开发经营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重大事件。

除著述之外，运城盐业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盐业生产技术方面。如高世扬的《运城盐湖制盐工艺过程及其制盐史的研究》（《盐湖研究》1997 年第 5 卷第 3-4 期）一文，分三个部分对制盐原料卤水的组成、日晒制盐工艺过程及冷冻芒硝工艺过程作了详尽的介绍，并且附有图表着重解析了晒盐工艺过程的三个阶段与芒硝冷冻和生产的工艺流程。吉成名的《运城盐池生产技术初探》（《盐业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则论述了运城盐池历史上通行的“自然结晶、人工捞采”和“垦畦浇晒法”两种主要的食盐生产方法。王玉萍的《运城盐湖芒硝生产工艺探讨》（《中国矿井盐》2004 年第 35 期）一文以芒硝析出原理为基础，详细介绍了运城盐池的现有芒硝生产流程，并剖析了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运城盐湖“分池制卤，集中存贮，移地结晶”的芒硝生产新工艺。

二是运城盐池资源综合利用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如张永朝、贺春宝的《运城盐湖主要资源及综合利用》（《矿业工程》2004 年第 2 卷第 6 期）一文介绍了运城盐湖的主要矿产资源及其利用现状，着重论述了运城盐池主要资源综合开发的可用技术。乔当致的《运城盐湖硝板综合利用初步探讨》（2003 年《山西化工》第 22 卷第 3 期）对运城盐池硝板的综合利用设计了一条工艺路线，并对实验室的关键程序进行模拟试验和结果分析，探讨了硝板综合利用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柴继光的《运城盐池旅游资源概况及其开发前景》（《化工矿产地质》1995 年第 17 卷第 2 期），指出运城盐池应开发潜在的旅游资源，走一条“无机盐化工基地和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三是运城盐池在历史上和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如刘清洋的《山西运城盐湖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矿产保护与利用》2001 年第 6 期）中就指出

了运城盐池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例如防汛能力差、工业废物侵入严重和盐湖土地权迟迟未能落实等。

(二) 选题意义及研究思路

从目前对运城盐业的研究现状来看，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古代运城盐业的研究和运城盐池的生产技术、地理生态、资源利用等专项研究方面，没有从百年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运城盐池的变迁趋势以及盐业经济和运城地方社会的关系予以分析总结。而在运城盐业发展史上，百年来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运城盐池的产品结构、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生产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与运城地方社会的联系也更为密切。所以本文将从19世纪末以来运城盐池的历史沿革入手，重点分析百年盐业对运城地方社会的影响及百年运城盐业发展的趋势。希望通过此项研究，我们能够对运城盐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本文分三个部分对百年运城盐业的变迁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从运城盐业历史沿革入手，通过分阶段的方式对运城盐业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将百年运城盐业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895—1912年，繁重的外债摊额造成了运城盐业的衰败；1913—1937年，丁恩“盐务改革”促进了运城食盐生产的发展，但盐税和盐业资源被外国列强大量掠夺；1938—1948年，运城盐业在日寇和地方军阀的掠夺破坏下濒临破产；1949—2000年，新中国的建立，运城人民从此成为盐池的主人，运城盐业生产得到恢复和重建。

本文的第二个部分主要论述百年盐业对运城地方社会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盐业不仅构成了20世纪运城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极大的推动了运城多种产业的发展，同时源于“池神崇拜”的庙会在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集市，极大地促进了运城地方的物资交流；在公益事业方面，19世纪末以来运城社会慈善事业的兴盛离不开运城盐商的经济资助，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城盐化局又是运城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者；盐业和运城教育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运学的维持得力于盐商的经济资助，20世纪初运学向较为完备的初级和中级教育体系转变。新中国建立后，运城盐化局实行企业办学，推动了运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运城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另外，盐池传唱的诗文歌赋也成为了运城重要的文化资源。

第三部分论述百年运城盐业的发展趋势：首先，“以食盐为主”的传统生产观念的淡化。这一观念曾严重阻碍了运城盐池化工业的兴起，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以后，“以食盐为主”的传统生产观念才改变。其次，由单一的食盐生产到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建立。运城盐池结束了单一生产食盐的历史，而代之于化工产品和以“盐池”资源为特色的旅游业的开发，逐渐形成了“无机化工业、日用化工业和旅游业”产业格局的多元化。再次，运城盐池对资源的利用方式不断调整和优化。长期以来，运城盐池主要盐业资源是单一性开发，并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运城盐池着力于盐池资源的综合性利用和保护性开发。钾盐、镁盐、钡盐等长期被废弃和忽视的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针对卤水一次使用，造成卤水资源浪费的弊病，开发出卤水循环利用的新工艺；改进生产工艺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开发低资源消耗型的日用化工产品 and 旅游业等。

（三）本文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文献

与盐业研究有关的历史学、经济学著作是本文的理论支持。如唐仁粤的《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丁长清的《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刘思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张培刚的《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本文采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清代蒋兆奎编撰的《河东盐法备览》（乾隆五十四年刊本），在该书“运商”、“引目”、“课额”、“律例”四门中记载了清代中期运城盐业“畦归商种”的生产方式和关于销售、税收的法令；江人镜、张元鼎的《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光绪八年刊本）对清末运城盐业的生产 and 运销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姚楷的《续增河东盐法备览》（清宣统年间刊本），该书的卷上部分对盐业与运城地方社会的联系多有关注，重点剖析了盐业经济对运城慈善事业和运学的影响；丁恩的《改革盐务报告书》（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8 年版）则对民国盐务改革的背景和具体操作作了论述。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写的《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该书对近代的盐务政策、盐业生产技术、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体制都有涉及；中共晋南地委组织编写的《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1961 年印刷），记录了运城盐池从上古时期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巨大变化。此外，盐务稽核总所编的《中国盐政实录》

（第4辑，山西省图书馆藏）和丁长清主编的《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也都提供了部分史料。

本文也采用了大量的方志资料，主要有《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两部志书都有专门章节对运城盐池进行介绍。

此外，还有一些统计资料出于历届政府公报，《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1987年印刷）等等。

一、20 世纪运城盐业的历史

运城盐池古称解池、河东盐池，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区南端，是一个表露于地表的天然内陆盐湖。盐池东西长 35 公里，南北宽 5 公里，总面积约 130 平方公里，池面海拔 320 米，水深 0.2—2.0 米，为三百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地质遗迹。运城盐池蕴含有丰富的资源，据 1958 年国家轻工业部勘探，盐池地表、地下都储藏着大量的盐类矿体：硫酸钠储量为 5915 万吨，氯化钠储量为 1472 万吨，硫酸镁 987 万吨，并含有相当数量的溴、钙、碘、钾、硼、锂、铯、锶、镓等 10 多种稀有元素^①。

历史上，运城盐池一直单一生产食盐。它所出产之盐曾名苦盐、解盐、河东盐、潞盐等。盐池至今已有四千年的产盐历史，相传虞舜所歌熏风阜即指此池^②。周代以前，运城盐池是开放的，天然结晶，任由百姓捞采、食用。周代始设盐官，“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③。春秋时期，齐国管仲实行盐专卖，由国家垄断经营，自此至清末，运城盐池都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的，以垄断为特征的盐业经营体制。

唐代以前，运城盐池生产方式主要是天日晒盐，自然结晶，集工捞采，有运城盐“不炼而成”的说法。唐代开始形成“垦畦浇晒法”，即利用人力，垦地为畦，将卤水灌入，利用天日、风力进行蒸发晒制食盐。这一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食盐的产量和质量，“遂得盐万斛以供京师”。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大历年间（766—779 年）运城盐池每年税收达到 150 万缗（量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约占全国盐利收入的 1/4，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1/8。^④唐代以前，运城食盐的运销是不加限制的。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 年）开始划分运城食盐销区，设榷运使，掌管运销事务。当时运城食盐运销范围很广阔，“西出秦陇，南达樊邓，北及燕代，东逾周宋”^⑤。

宋代运城盐池“垦畦浇晒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食盐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宋至道二年（996 年），运城盐池食盐产量为 4351.8 万斤，庆历八年（1048 年）

^① 运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7 页。

^② 乾隆《解州全志》卷 17，本州艺文，舜帝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③ 柴继光：《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版，第 37 页。

^④ 运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0 页。

^⑤ 运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4 页。

盐池产量增至 8250 万斤，几乎是至道二年（996 年）的两倍^①。宋代运城食盐的产销区域比唐代也更为扩大，且打破了政府专卖制度，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长期并存。

元代废除了“垦畦浇晒法”，而代之以以前的天然结晶，人工捞采，运城食盐产量明显下降，年产量一般在 400—600 万斤左右。同时食盐销区也有所减小，原陕西、河南的许多地方改食韦红盐（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花马池诸池盐）和沧盐（即沧州海盐）^②。

明代运城盐池又恢复了“垦畦浇晒法”，食盐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 1604 年运城食盐产量为 28814 万斤，达到运城盐池产盐历史的最高水平。但食盐销区比前代有所缩小，主要行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汝宁、南阳四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③。

清代运城食盐生产沿用“垦畦浇晒法”，“专事畦种”，并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生产方法，即：“每岁二月一日畦工入池，盖庵治畦，俟薰风一至……灌之以水，曝之以日，先用桔槔挹水注入畦之首段……挹注次段，次段水咸色赤，挹移三段，俟其澄清，开门媵隅，以灌四段，段段开灌，悉依前法，要俾清流盈科而进，极乎产盐之畦而止，水深不过一二寸……一俟风力震荡，逼以烈日，则盐成矣。”^④ 这里所说的若干段畦地就是蒸发池，将卤水依次引入四段畦地中，进行蒸发，得到高浓度的卤水，等到适合的风日条件，食盐就自然结晶出来。

在经营和运销方面，实行“畦归商种”制，就是清政府把畦地交给商人经营（商种），并向商人征收畦课（盐税）。盐商要想获得对运城盐池的经营权，就必须向政府缴纳足额的盐税。清代运城盐商分为“坐商”（只管产盐，不管运销）和“运商”（只管运销，不管产盐）。但不管是坐商还是运商，都必须向政府缴纳课税之后才能从事食盐的生产和运销。

“专事畦种”和“畦归商种”制极大地提高了运城食盐的产量，据姜道章先生统计，从道光 20 年到光绪 16 年间（1840—1890 年），运城盐池平均年产量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81 页。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86 页。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87 页。

^④ 《河东盐法备览》卷 5·坐商门。

为 109002 吨。连续 50 年，食盐年均产量突破 10 万吨^①，这在整个中国古代盐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当历史进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伴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和经济的调整，运城盐业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不平等条约与运城盐业；丁恩“盐务改革”前后的运城盐业；日寇与军阀对运城盐业的掠夺；新中国运城盐业的发展。

（一）清末不平等条约与运城盐业的衰败

1895 年 4 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 2 万万两白银。后又增加 3000 万两的“赎辽费”，两项合计共达 2.3 亿两白银^②。当时清政府每年岁入只有 8000 万两，突然增加了这样巨额的负担，财政上必然陷入破产的境地。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清政府从 1895 年起开始以中国盐税作为抵押举借外债，偿付赔款。据统计，从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到 1911 年清朝灭亡，包括庚子赔款在内，清政府以盐税为抵押举借了 10 次外债^③。

清政府在运城盐池特别设立专项盐税用于对外赔款。如专为归还俄、法、英、德四国“洋款”的“晋陕另筹加价”，1896 年，“晋陕另筹加价”增银 71969 两 8 钱；1900 年增银 3179 两 1 钱 9 分 5 厘^④；专为“庚子赔款”的“偿款摊捐”和“公约赔款加价”，“庚子赔款”中，山西分摊白银 45.357 万两，几乎全部由运城盐税负担^⑤。从 1902 年起，“公约赔款加价”每斤加收 2 文，并将陕、豫盐引一律加征，每名（计量单位，一名约计 28800 斤）合银 40 两。年征银 211946 两^⑥。综合以上赔款，当时运城盐池每年要分担赔款白银 32.2 万两，几乎占当时盐池全年税收的 1/3^⑦。

为了保证盐税收入的增加，1895 年，清政府在运城盐池原盐务机构——河东陕西都转运盐使司（名为“河东陕西”是因为河东潞盐运销陕西，皆隶属于河东的缘故）之下又设立销盐总局，加大对盐池的管理和征税力度。主要税种如下：

“加引”。“引”即盐引，是在引岸制度下由户部授予盐商的销盐执照，上面载明盐商姓名、籍贯、行销地点及数量。清政府实行“加引”，并不管盐池产

^① 姜道章：《论清代的盐业贸易》，《盐业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② 李建昌：《官僚资本与盐业》，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2 页。

^③ 丁长清，唐仁粵：《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36 页。

^④ 运城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1 页。

^⑤ 唐仁粵：《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1 页。

^⑥ 运城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11 页。

^⑦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1961 年印刷（内部资料），第 65 页。

量多寡，也不顾盐商销售能力，强令多销，每增加一引即多纳一引的税，有时销路阻滞，或商人无力投资，只好凭空纳税，不多销盐。

“加价”。实际上就是加税，其中有所谓的“通行加价”（其他行业征税不足，由盐税补充）、“筹饷加价”（遇到重大军情，增加税收）、“铁路加价”、专为归还俄、法、英、德“洋款”本息的“晋陕另筹加价”、专为偿还《辛丑条约》中规定赔款的“公约赔款加价”等。

“摊捐”。凡遇有重大开支，即向盐商“摊捐”，并且一经确立就立为“常捐”，再不取消。诸如“恤政捐摊”、“团练经费”、“商捐军饷”、专为偿还《辛丑条约》中规定赔款的“偿款摊捐”等，其中的“团练经费”，每人就要摊捐三两六钱，“墙工经费”每人也要一两四钱。

以上三个税种称为正、杂盐课，从道光至宣统年间，清政府每年在运城盐池征收的正、杂盐课数目，越来越多。据统计：道光初年（1821年），河东正、杂盐课每年概为50万两，至光绪末年（1907年）增加到113万两，比道光初年增加了1倍还多^①。

繁重的盐税直接导致了运城盐业的衰落，盐商大量破产，“专事畦种”的生产难以为继，食盐产量到晚清时日益下降。如前所述，从1840—1890间，运城盐池平均年产量为109002吨。而到光绪年间（1875—1907年），运城食盐平均年产约5.25—7.00万吨，到宣统三年（1911年），年产则下降为2.6万吨^②。同时，食盐运销业务陷于疲敝，销区缩小。19世纪末，运城食盐“行销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其中一些县份兼食土盐），以及陕西、河南的一部分地区”^③其中山西中部、北部一些地区如：朔县、代县、孝义、山阴等改食当地所产土盐；河南的如宁改食淮盐，怀庆府改食长芦盐；陕西的延安、汉中等地改食花马池盐。

（二）丁恩“盐务改革”前后的运城盐业

1912—1937年，运城盐业先后经历了河东临时盐政处和河东盐务稽核分所的管制，其中河东临时盐政处昙花一现，仅存在了7个月，而河东盐务稽核分所一直维持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0—91页。

^② 《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

^③ 丁长清，唐仁粲：《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河东盐务稽核分所隶属于北京盐务稽核总所，它是北洋军阀“善后大借款”的产物。1913年4月，袁世凯以全部盐税作担保与外国银行团签订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第二、三、四条款分别规定：“……二、中国盐税，全作为本次借款之担保；三、北京设立稽核总所，作为代中国征收盐税，偿还借款本息的机关。该所以中国人为总办，洋人为会办；四、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设华员经理、洋员协理各一人……”^①。据此，1913年1月，盐务稽核总所在北京成立，英国人丁恩出任会办，总揽中国盐务大权；同年6月在运城设立河东盐务稽核分所，英国人柏理稳出任协理。

民国初期（1913—1918年），北京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整顿盐务，改革盐政，集权中央”^②的盐务改革，在中国初步建立了盐税稽征管理制度和食盐自由贸易制度。1914年5月，丁恩巡视运城盐池，盐务改革也扩展到运城盐业。

1、河东临时盐政处与运城盐业的暂短恢复

在河东盐务稽核分所成立和丁恩改革之前，运城盐业的管理机构为河东临时盐政处，它隶属于河东晋军政分府（为辛亥革命中由陕西革命军和河东革命党人成立的临时政权）。河东临时盐政处自1912年2月成立以来，针对19世纪末运城盐税负担繁重、产销疲敝的局面以及辛亥革命中销路堵塞、资金周转不灵，无力维持经营等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草拟了《河东盐政处暂行简章》，“保存潞纲全局各循秩序，不使紊乱”，以便稳定生产，畅通销路，保证盐税收入^③。

其次，在恢复生产方面，劝令盐商各营原业，安心生产，并多方面筹集白银7000两来解决资本家资金短缺的问题^④。

再次，在扩大销售方面，对清政府遗留的苛税进行改革：销往山西的盐，每石（容量单位，1石等于100升。）减征税银38.57两；销往陕西的盐，每石减征17.8两；销往河南的盐，每石减征17.625两。另外，对于清朝的先纳税后运

^① 山西省图书馆藏：《中国盐政实录》第四册，《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②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7页。

^③ 柴继光：《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57页。

^④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1961年印刷（内部资料），第65页。

盐的规定，改为运盐后六个月以内交清课税^①。此外，又明令各地验盐局、验盐所等部门减免各种规费；同时增开南禁门，缩短运销河南的路程以减少运费。

虽然河东临时盐政处仅仅维持了7个月，但它采取的措施使运城食盐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据统计，1912年的食盐产量即达到66693吨，相当于清政府统治时期平均年产量75000吨的89%^②。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运城盐业的恢复很快就引起了军阀的注意。首先是陕西军阀，他们于1912年强行取得了渭北地区的食盐行销和管理权之后，又于当年5月以“助剿土匪”为借口将军队开驻运城。后经交涉，河东临时盐政处拨给食盐600万斤，陕西军队才撤走。

接着是山西军阀阎锡山。阎锡山篡夺革命政权后，派人到运城成立“筹饷局”，对盐池大加搜刮，并对河东临时盐政处进行监视。1912年7月强行发给临时盐政处总、协理委任状，控制了盐池税收。

2、丁恩“盐务改革”与运城盐业发展

1913年1月，袁世凯取消了河东临时盐政处，成立盐“运使公署”，但是，运城盐业却长期被其后的河东盐务稽核分所垄断。1914年5月，北京盐务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巡视运城盐池，运城盐务改革也随之开展起来。

首先，在盐税稽征上建立了由河东盐务稽核分所直接征税的盐税稽征管理制度。按辛亥革命以来的征税方式，各盐区大都先放盐后收税，盐商通常采取支付期票的办法，有意拖欠盐税款，致使各盐场放盐应缴的税款与盐商实际缴纳的税款相差悬殊。于是丁恩于1913年10月下令实行“先课后盐”政策。据此，河东盐务稽核分所规定“凡是运售食盐者，都得事先填写印有英文和中文的纳税四联单，经过河东稽核分所经理、协理会同签字，向指定的中国银行运城分行交税后，再从稽核分所领取‘挚盐准单’，才能到池内领盐。”^③

同时，丁恩还坚决主张取消卤耗，切实管理盐斤称放事宜。所谓“卤耗”，就是商人在不纳税的情况下按规定每担（重量单位，100斤等于1担。）多放入的若干盐斤。本来清政府的“卤耗”政策是为了弥补食盐损耗给商人带来的损

^①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1961年印刷（内部资料），第65页。

^② 《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卷六

^③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1961年印刷（内部资料），第68页。

失，但后来因为盐官收受贿赂，与盐商互相勾结，卤耗不断增加，使得国家盐税收入蒙受损失。因此，丁恩坚决主张取消“卤耗”。河东盐务稽核分所成立后，很快就控制了运城食盐的称放权利，规定：运盐出池，须先经稽核分所人员过秤后才能放行。

其次，在运销方面，取消官卖和专商制度，按照西方 19 世纪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经营原则，实行就场征税，开放自由贸易。丁恩认为“如能将全国引岸一概化除，而实行提倡自由贸易的宗旨，则不特政府每年收入可达 1 万万之数，且一切开支之经费，亦当大为减少。”^①1914 年 3 月，丁恩撤销了河东销盐局。1916 年又开放了运城盐的“陕岸”销区。

盐务改革初步实现了运城盐业的近代化管理，运城食盐产量有了一定的增加。据统计，1913 年和 1914 年，运城盐池食盐产量仅为 23363 吨和 25850 吨，但到了盐务改革的第二年（1915 年），运城食盐产量即达到 73508 吨，比上一年产量增长了 2.84 倍。此后，运城食盐产量还有增加，1916—1919 年，年均食盐产量为 78268 吨^②。因此，丁恩的盐务改革在客观上促进了运城盐池食盐生产的发展。

但是，丁恩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大对盐税的掠夺，正如丁恩所说：“河东管理的改革……本身是简单的，所要做的是明确一个简单、直接的税，由一个征税机构负责征收，并检查是否有没有纳税的盐被运出盐湖。”^③因此，河东盐务稽核分所采取了赤裸裸的掠夺方式——提高税率，增加税收。1912 年原销山西之盐每担（重量单位，100 斤等于 1 担。）征税 1.566 元，1914 年河东稽核分所开始征税时，就增为 2 元，1921 年又增为 2.5 元，1925 年增为 3.2 元^④。凭借税率的增加，外国银行团从盐池搜刮走了大批财富。

从表 1 可以看出：1914—1919 年六年间，运城盐池累计上缴盐税 18522905 元，其中交给五国银行团的款额达到 17581736 元，占总额的 94.9%。由此可见，运城盐务的近代化改革是以运城盐业主权的丧失为前提的，盐税收入的增加即意味着列强对盐池税收的更大掠夺。

^① 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69 页。

^②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1961 年印刷（内部资料），第 70 页。

^③ 丁恩：《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台湾文海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0 页。

^④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1961 年印刷（内部资料），第 69 页。

表1 运城盐池税收情况(1914—1919年)^① 单位:元

年别	全年税收总额	交五国银行团款额
1914	1924874.53	1829784.04
1915	3963563.84	3286489.75
1916	2101311.14	2054235.42
1917	3683024.54	3426814.28
1918	3676764.54	3028846.14
1919	3173367.04	3028846.14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运城盐业

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承担了北洋军阀时期遗留下来的外国债务,而且还以盐税为担保举借了一些新外债。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以盐税作抵押的外债就突破了1000万银元,到了1932年则迅速接近1800万元^②。因此,此期中国盐税主权仍然掌握在外国银行团的手里。但是,丁恩盐务改革中确立的一些盐务管理措施一直保留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运城盐业,大体上仍依循丁恩盐务改革,实行由稽核分所直接征税的盐税稽征管理制度、自由贸易制度。此期,运城盐税仍有相当一部分偿还给外国银行团。据统计,1927—1929年,运城盐池外债摊额约为30.8万元,到了1930年,接近39万元^③。此后,随着外债额的急剧增大,南京国民政府曾在全国五次增加盐税或提高税率。因此,1931年之后,运城盐池年均外债摊额保守估计应当突破40万元。

在食盐生产和销售上,由于受到时局影响,运城盐业的产销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这一时期运城食盐产量见下表^④。

表2 运城盐池食盐产量(1927—1937年) 单位:吨

年别	产量	年别	产量	年别	产量
1927	73700	1931	59950	1935	68300
1928	151950	1932	56600	1936	76200
1929	134450	1933	51200	1937	36250
1930	116450	1934	64100		

^①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1961年印刷(内部资料),第65页。

^② 丁长清,唐仁粦:《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1—162页。

^③ 丁长清,唐仁粦:《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1—162页。

^④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1961年印刷(内部资料),第70页。

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运城食盐产量连续三年（1927—1929年）突破10万吨，特别是1928年，产盐近15.2万吨，达到了19世纪末以来的最高峰。这是因为1927年南北军阀战争发生，海盐销路受阻，给运城盐销售提供了有利条件，客观上刺激了食盐生产。1931年战争结束后，盐业产量迅速回落。但总的说来，此期食盐的生产还是有所发展。根据表2，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运城盐池共产盐近88.9万吨，平均年产盐8.08万吨，这是19世纪末以来的最好水平。

运城食盐的销售也不稳定。1927年、1928年两年，运城盐的销量急剧增加。1926年，运城食盐销量为17526吨，1927年增加了41643吨，1928年又在1927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9891吨^①。这时盐场积压的存盐基本销售一空。到了1930年，阎、冯倒蒋战争爆发，运城盐的销路大受影响，销量全面回落。据《运城市志》统计，1928年，运城盐的总销量为92254吨，1930年则突降至50558吨^②。

运城盐商也在短暂的盈利之后纷纷破产，1930年之后盐商数量逐渐减少。根据《运城市志》统计：1928年运城盐池共有盐商64家，1929年共有84家，但到1933年仅剩下39家，4年内有45家盐商相继破产。1933年，剩下的39家盐商，由于连年亏损，也无力全部开工晒盐。1933年，登记注册的畦地为549号，但当年实际开工晒盐的仅有276号^③。

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改革盐务机构，将河东盐务稽核分所与盐“运使公署”合并，另组“河东盐务管理局”。原稽核分所经理蔡国器、协理柏克（挪威人）分任正副局长，包揽一切行政。其统治一直持续到1938年日军侵占运城。

（三）日寇、地方军阀对运城盐业的掠损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3月，日军攻占运城，盐池沦陷，原“河东盐务管理局”迁往河南。日寇在运城设立由日本人龟荣带刀控制的“山西盐务管理局河东分局”，统辖盐池各盐场，把持盐政，对盐池资源大肆掠夺。

首先，日寇大肆劫掠盐池物资。日军占领运城后，在汉奸、伪军的配合下，经常到盐池公开劫掠食盐、粮食和生产工具，致使盐场物资损失殆尽，生产难以继。1938年，全年盐池连一粒盐都没有生产。同时，日军借办化工厂为名，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8页。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8页。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3页。

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四季不辍地抢运硝板（即白钠镁矾）等化工原料，据统计，1938—1945年，日军共掠夺走食盐102400吨，硝板数十万吨^①。

其次，日寇通过提高税率的方式加大了对盐池的掠夺。

表3 运城盐池税率（1938—1945年）^② 单位：日元/市担

产地	销地	1938—1940	1941—1942	1942—1943	1944年1—8月	1944年8月以后	1945年1—6月
山西	晋北、晋南	4.80	4.80	8.20	8.20	11.90	71
	陕西、河南	3.00	3.00	6.40	6.40	11.90	71

据上表，1938—1945年，运城盐池的盐税率上涨达20倍之多，这是“山西盐务管理局河东分局”多次提高盐税率的结果。据《中国盐业史》记载，日伪在运城盐池“曾于1942年1月、1944年6月、1945年4月、1945年8月四次提高盐税”^③。通过提高税率，日伪在运城盐池共掠夺走盐税1600万元（伪联币）^④。

再次，日寇推行民食用盐的配给制度，控制食盐运销。日寇取消了过去食盐由商人自由贩运的办法，改由“山西盐务管理局河东分局”统一收购，然后分配给各敌伪“合作社”进行配销，实行食盐配销制，这实质上是一种盐官卖制度。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造成食盐恐慌，而且操纵了盐价，导致许多运城盐业商人的破产。

日寇对盐池的掠夺，使得运城盐业生产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据统计，抗日战争前，运城盐池坐商共有47家，1938年日军侵占运城，盐池坐商全部出逃，当年盐池颗粒无收。1939年盐池恢复生产，坐商仅有30家，产盐5416吨，不及正常年份的1/10。1941年为抗日战争时期食盐产量的最高年份，也仅为23417吨，相当于战前正常年份的1/2^⑤。到1945年底，盐池畦地荒芜面积占全池畦地总面积的5/6^⑥。由于盐池产量急剧下降，盐的供应大幅度削减。据统计，1937年实放食盐472956担，1938年减少到133545担，1939年则仅有65担^⑦，（运城盐池一般是头年产盐，次年才供应市场，故1938年所供之盐为1937年所产，

^① 中共党史研究室：《日军侵华罪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

^② 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6页。

^③ 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97页。

^④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⑤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4页。

^⑥ 运城盐化局档案：《解盐制盐畦地之沿革》民国35年10月，解池盐场公署编印

^⑦ 民国《盐务月报》，1942年第7期第75页。

1938年没有产盐，1939年即几乎无盐可供）那些长期仰赖运城食盐供应的秦、晋、豫等省甚至得不到最低限度的食盐供应，常常被迫淡食。

抗日战争结束后，运城盐池被阎锡山截收。阎锡山占领盐池后，首先派人接收“山西盐务管理局河东分局”，对盐池进行全面管制。然后抓派晋南十几县的民间车马，大量外运盐池的存盐。据记载，运出盐池的食盐达2万吨左右，约占盐池存盐总量的2/3^①。

阎锡山接收盐池后不久，194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也派专员到达运城，成立了“山西盐务管理局南路分局”，同年11月，改称“解池场署”。重申废除专商引岸，由民制、官收、官运、商销改为民制、官运、商销，由南京国民政府加以管理。同时，南京政府进一步在运城盐池提高税率，加派捐税。仅1947年一年之内就四次提高税率，即每担10000元、12000元、14000元、16000元（法币）。据全国盐税收入统计表记载：民国34年（1945年）运城盐税52000元，民国35年（1946年）就猛增为2535000元（法币）^②。沉重的盐税负担导致了各盐场纷纷破产，大批工人被解雇，畦地面积缩小。据统计，1947年，运城盐池工人只有1300余人，畦地荒芜面积达50%以上。而运城盐池的食盐产量从1945年日寇投降到1948年2月运城解放，盐池平均年产量仅为27000吨。^③运城盐业全面衰退。

（四）新中国运城盐业的发展

1948年2月8日，运城盐池解放。2月16日晋冀鲁豫根据地边区政府派姜时彦同志接管运城盐池，成立“潞盐管理局”，姜时彦任局长，管理盐池的生产、运销、税收、缉私工作。潞盐管理局首先没收了5家官僚资本和汉奸经营的盐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第一批国营盐场；并积极扶植私营盐场恢复生产，给予低息贷款前后达91287万元（冀币）。当年在36家私营盐场中，除6家因完全破产无力恢复生产外，其余30家都恢复了生产，产盐量达36823吨，比1947年提高了7.35%^④。同时，1948年底运城食盐销区已恢复到山西49个县、河南31个县^⑤。

^①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1961年印刷（内部资料），第103页。

^② 运城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4页。

^④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⑤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运城盐业经过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的恢复发展、“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无机化工产品、日用化工产品、旅游业为主体的多元化产业结构。

1、运城盐业的恢复与发展

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和运城人民政府建立，运城盐业生产和全国经济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1) 运城盐池新的管理体制和机构的确立

1949年4月，潞盐管理局归陕甘宁边区西北盐务管理局领导，并设附属单位潞盐运销公司。1950年5月，潞盐管理局划归中央财政部分盐务总局领导，改名为“山西盐务管理局”，而潞盐运销公司被分离出来，划归“中国盐业公司”领导，改名为“山西盐业公司”，实行产销分离。1952年7月，山西盐务管理局随财政部盐务总局一起被划归为轻工业部领导，它虽然还为国家代收盐税，但却完成了以税收为主向以发展生产为主的历史性转变。1954年11月，山西盐业公司并入山西盐务管理局，运城设分局。经过合并后的运城分局，既是运城盐业生产、运销、科研等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直接经营生产和运销的经济实体，至此，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在运城盐池确立。

(2) 运城盐池恢复和发展食盐生产的措施

建国初期与“一五”计划时期，运城盐池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食盐生产。第一，组建社会主义国营盐场。1949年盐池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汉奸经营的盐场、接管无力继续经营的私营盐场、以及在废弃的私营盐场的滩地上重新组建等方式共组建了14个社会主义的国营盐场。这些国营盐场占盐场总数的30.43%，当年食盐产量为23544吨，占产盐总量的32.46%。^①已然成为盐池经济的骨干和支柱。1950年10月，成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国营盐场管理处”，直接管理各盐场的生产。这样就可以进行人力、物力、财力的统一调配，初步消除了国营盐场各自独立经营的分散状态。

第二，恢复并改造私营盐场。在发展国营经济，组建国营盐场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还积极扶持私营盐场恢复生产，给各私营盐场提供了工具、牲口、车辆

^①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等 76 种物资，价值达 28262 万元（冀币），并按每斤盐 25 元（冀币）的价格折价偿还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从各盐区运走食盐的欠款^①。

1952 年，山西盐务管理局号召、动员私营盐场合并办厂，走联合经营之路。运城盐池 30 家私营盐场合并为同兴、新兴、裕成厚、鸿益、鼎新、永泰、利民、惠群 8 个盐场。1955 年 4 月，私营鸿益盐场和裕成厚盐场率先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鸿裕盐场。当年这个场就生产食盐 13888 吨，较 1954 年末实行公私合营两场产量总和增加了 71.78%。超过解放以来原两场产量最高的 1949 年产量的 32.77%^②。11 月，惠群、鼎新、永泰、利民、新兴 5 家私营盐场合并为五新联营场。1956 年 1 月 24 日，五新联营场并入鸿裕盐场。

第三，开展生产改革运动。在生产改革运动中，涌现出大批技术革新成果。比如李保银发明的“手摇水车”，使扬水效率由过去的每小时 1800 斗（容量单位，10 升等于 1 斗）提高到 2500 斗；李忠义试制成功“阶梯横形循环铲盐法”，使铲盐效率提高 50—70%；尹天德等人研制出“双轮水车”，使抽水效率提高了 1 倍。经过生产改革运动，1952 年上半年，国营、私营盐场共产盐 31762 吨，完成全年任务的 52.9%，其中国营盐场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45.6%，私营盐场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3.4%^③。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952 年，中央给盐池拨款 13 万元（新人民币），修建了 15 条大港道，使原来的多级扬水变成了一至三级，同时扩大蒸发池和结晶池的面积 1086 亩，当年共产盐 45071 吨^④。“一五”期间，国家又给盐池投资 227 万元，扩大结晶池面积 12717 亩。^⑤这就为以后组织大规模生产，充分发挥畦地的效率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以上措施的施行，运城盐池的食盐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如下表：

^①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1961 年印刷（内部资料），第 121 页。

^②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1961 年印刷（内部资料），第 197 页。

^③ 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4 页。

^④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等：《银湖春光》，山西运城市文化用品厂 1961 年印刷（内部资料），第 144 页。

^⑤ 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6 页。

表4 运城盐池食盐产量(1949—1957年)^①

单位:吨

年别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食盐	73000	58000	57000	45017	42826	47606	81379	88838	77186

在建国初期和“一五”时期,运城盐池共产盐 570385 吨,平均年产食盐 63426 吨。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衰败之后,运城盐池的食盐生产逐渐回复到正常水平。

食盐销售方面,在潞盐管理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国营运销企业—安邑潞盐运销公司,食盐销路也得到恢复,行销晋南 47 个县,陕西 40 个县,豫西 31 个县,全年销售总量 56327 吨^②。1949 年 5 月,西北区盐业公司在西安成立,潞盐运销公司改为西北区公司安邑办事处。1950 年,根据国家“公私兼制,公私兼运,公私兼销”和“生产归工业,运销归贸易,税收归财政”的盐务方针,实行产销分离,潞盐运销由中国盐业公司下设的山西省盐业公司经营。1952 年,国家对运城食盐实行了公收和统销政策,并逐步把运城食盐运销纳入国家统一经营的轨道,并继续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一百多个县市。

(3) 运城盐池化学工业的初创

运城盐池蕴藏了丰富的化工资源,但长期以来开发出来的只有食盐一种产品。新中国成立以后,潞盐管理局对于如何综合开发利用盐池资源非常重视。一批化工厂纷纷建立:1948 年秋季建成“国营芒硝公司”,1951 年兴建“大兴硝厂”和“运通化工厂”,1952 年 7 月,两厂联合组建为地方国营运城化工厂。此外,1952 年前后,在盐池周边地区出现了正兴、通兴、聚盛、义盛、夏兴成、和丰、新兴等七个私营化工厂。这些化工厂利用盐池的硫酸钠资源生产无水芒硝(硫酸钠)和硫化碱(硫化钠)。“一五”期间,盐池化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批量产出纯度为 95% 的无水芒硝,劳动生产率比 1952 年提高 3.12 倍。化工产品产值也由 1952 年占全池产值的 21.08% 上升到 1957 年的 74.4%^③。但是,化工生产被定位为“盐池的副产品,不能影响食盐的生产”^④。从 1949—1957 年,运城盐池芒硝生产量如下表:

^① 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 1987 年印刷(内部发行)。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88 页。

^③ 丁长清、唐仁粲:《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6 页。

^④ 运城盐化局档案馆藏:运盐(56)第 96 号文件

表5 运城盐池无水芒硝产量(1949—1957年)^①

单位: 吨

年别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无水芒硝	113	—	1858	8261	31808	34736	20207	48352	90200

1949年无水芒硝生产仅处于实验阶段,紧接着的是无水芒硝连续三年的国内市场疲滞。因此,1949—1952年,运城盐池无水芒硝生产量并不大。但是从1953年起,无水芒硝产量开始大幅提高,并在1957年首次超过食盐产量,达到90200吨。从表5可以看出,1953年的无水芒硝产量是1952年的3.87倍,而1957年的无水芒硝产量又是1953年的2.84倍。此期,运城盐池共产无水芒硝235535吨,年平均产量为26171吨。

关于化工产品的运销,1955年之前由盐池自产自销。1955年之后,由国家投资扩大无水芒硝和硫化碱的生产规模,自此,两种产品的生产和运销开始纳入国家计划。

2、“政治非常”时期的运城盐业

1958年,中央盐务总局将“山西盐务管理局”下放给地方,改名为“地方国营运城盐务分局”,归山西省工业厅领导。1958年7月,地方国营运城盐务分局、地方国营运城化工厂和鸿裕盐厂合并,成立“山西省地方国营运城盐业化工局”(简称“盐化局”)。

1958—1976年,运城盐池先后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经济上的冒进主义和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曾给运城盐业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但总的说来,此期运城盐业在曲折中还是有所发展,突出的表现在盐池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上。

1958—1976年,运城盐池食盐产量日益减少,而化学工业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如表6所示:

表6 食盐和无水芒硝产品产量统计(1958—1976年)^②

单位: 吨

年别	1958	1959	1962	1964	1967	1970	1972	1975	1976
无水芒硝	152548	158432	63427	100462	106137	225871	282433	275400	263565
食盐	45713	57317	61658	39132	41652	31009	61105	52760	57009

^① 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1987年印刷(内部发行)。

^② 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1987年印刷(内部发行)。

如前所述，在建国初和“一五”时期，运城平均年产食盐 63426 吨。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运城盐池共出产食盐 1013945 吨，平均年产食盐 50697 吨。食盐生产有所萎缩，与此相反，此期无水芒硝产量则较前一阶段有较大提高。据统计，1958—1977 年，运城盐池共生产无水芒硝 3592728 吨，平均每年生产 179636 吨，为前一阶段年平均产量（26171 吨）的 4.97 倍。从表 6 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食盐产量与芒硝产量的差距越来越大，化工业逐渐代替食盐生产成为运城盐业经济的主导。

运城盐池化学工业的发展得力于运城盐化局采取的以下措施：第一，开辟新的芒硝生产基地。盐化局先是将盐池北部的荒废畦地开辟为硝田，后来又越过盐池隔堰，在走滩开辟新的硝田。1969—1979 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全池硝田结晶畦地由 3 万余亩扩大为近 7 万亩。

第二，增加化工车间数量。1958 年由运城盐化局新组建了 11 个生产车间：1—6 车间为化工生产车间，8—10 车间为食盐生产车间，7 车间负责 6 个化工车间的芒硝原料供应。1959 年第 8 车间改为盐硝混产车间。1962 年，第 7、8 车间合并成立盐硝混产的第四厂，第 9、10 车间合并成立专事食盐生产的第五厂。1969 年 3 月只有五厂继续专事食盐生产。

第三，建立新的化工厂和开发新的化工产品。主要有解州化工厂，1958 年创建，以盐池硝田为基础，生产硫酸钠和少量氯化钠；运城盐业化工局二厂，1958 年开始筹建精硝设备，1964 年投产，同时引进间歇式转炉。1969 年改方锅生产为火塔生产。1970 年前后，建立两台连续转炉生产硫化碱。1972 年试制成功白色结晶硫化碱，填补了国家化学工业的一项空白；运城盐业化工局四厂，1968 年筹建，生产 85% 无水硫酸钠。1974 年采用真空自然循环外加热式蒸发工艺，生产 98% 无水硫酸钠。

关于运城盐业的运销，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食盐调运紧张，销量猛增，供应不足，1962 年，山西省盐务运销局成立，专管运城食盐的调运工作，并派专员常驻安邑转运站，安排运输，共出盐 4 万余吨，济销晋中、晋南地区^①。1964 年 1 月 1 日，山西省盐务运销局改名为中国盐业公司山西省公司，在运城设立分公司，统一安排运城盐的运销。购进和销售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计划指标。1965

^①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8 页。

年4月1日,根据国家经委批准的《关于试办中国盐业公司(托拉斯)实施方案》^①,山西省公司收归托拉斯管理,根据运城盐的流向在运城建立安邑盐务站,并在安邑盐务站下设立阳方口、介休、运城、晋城等批发部。运城盐池推行供需合同制,盐化局与安邑盐务站及各批发部签订食盐出售合同。

3、改革开放与运城盐业发展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全国企业整顿工作拉开帷幕。1983年,全国盐业会议又提出了“以盐为主,盐化结合,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伴随着中国企业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运城盐业由食盐一种产品生产转向以芒硝为资源的化工、日化系列产品的生产,大搞多种经营、开放经营。20世纪末,南风集团又开始向盐资源特色旅游业迈进。

(1) 改革开放与运城盐业转产

1978年,运城盐化局下放为地直企业,产品由化工部包销,生产计划由地区化工局主管下达。1980年后,盐化局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1988年,实行经营承包制,盐化局与运城地委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承包经营合同。新的经营管理体制增加了运城盐化局的经营自主性,使盐化局能够根据盐池自身资源状况和市场情况,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缩减并终止食盐生产,进一步扩大盐化工生产。

首先,缩减并终止食盐生产。运城盐化局于1980年决定将最后一个专事食盐生产的五厂,改为盐硝混产厂。1984年,五厂制盐结晶池又缩减为3837亩。1985年8月10日盐化局向国家轻工业盐务总局提出终止盐产申请,并很快得到批复:“运城食盐产量连年下降,质量差,污染严重,盐的水不溶物和水溶物杂烩大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不宜再作食用盐和工业盐。”“鉴于以上情况,我局同意1986年不再安排生产计划”^②运城食盐的生产运销不再纳入国家计划。从此,在中国盐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运城盐池,结束了近四千年的产盐历史。

其次,扩大盐池化学工业的生产。20世纪80年代以后,盐化局进一步扩大盐池化学工业:第一,扩大硝田面积,提高芒硝产量。食盐生产停止后,全盐池统一变为硝田。1987年全盐池芒硝结晶池扩大为121259亩。1992年,全盐池硝田总面积为256206亩,其中结晶池面积为119426亩,蒸发池面积为67228亩。

^①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② 运城盐化局档案馆藏:运盐(86)第82号文件

从1987年起,除1988年生产芒硝194万吨外,至1996年,芒硝年产量均在200万吨以上,基本上能够满足全盐化局化工生产发展的需要^①。

第二,改进生产工艺,更新生产设备。以无水芒硝的生产为例,如前所述,初期是铁锅熬制脱水生产。到了80年代,设计了四效蒸发新生产工艺,这一工艺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再以硫化碱的生产设备为例,初期是用原始的单面反射炉进行生产,80年代先后建成了连续转炉,间歇转炉,不仅减轻了工人的劳动负荷,而且使得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极大提高。

第三,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扩大产品销路。1949年盐池化工产品仅有无水芒硝和硫化碱两大类,而且产量有限,化工产品产值在整个盐池总产值中只占到7.5%。八十年代以来,运城盐池除生产芒硝和硫化碱外,还生产金属镁、硫酸钾(钾肥)、硫酸镁、硫酸钡、阻燃剂、一水硫酸和溴素等10多种产品,在盐池总产值中的比重几乎占到100%^②。同时盐池化工产品的销路也进一步扩大,80年代以来,全国有24个省市的350多家企业和运城盐化局建立了购销关系,利用盐池化工原料作为玻璃、造纸、纺织、医药、染料、人造纤维等工业生产的原料或辅助性原料。而且还远销日本、俄罗斯、法国、印度、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无水芒硝和硫化碱出口量均占到全国出口量的60%以上^③。

(2) 20世纪末运城盐池日用化工产品的开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城盐化局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1992年,盐化局与香港中策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鸿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由于香港二期投资不到位,双方协商终止全方位合作,变为局部合作。1992年5月,盐化局收购了破产的运城地区洗涤剂厂。1996年4月,盐化局联合西安日用化学公司、中国耀华玻璃集团等企业,组建了以盐化局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盐化局处于绝对控股地位。1997年6月,南风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南风化工”股票A股6200万股,成为上市公司。后来又以联合、兼并、收购、控股等方式,先后吸纳了四川彭山元明粉厂、安徽安庆合成洗涤剂厂、贵州安顺合成洗涤剂厂等五家企业。到1997年底,南风集团已发展成为拥有资产20亿元,本部8个分公司,异地8个子公司的大型国家级企业集团。

^① 运城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

^② 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③ 柴继光:《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同时，运城盐业的多样化经营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无机盐化工业和日用化工业同时并举的新阶段。

1992年，随着各地硫酸钠资源的开采，无机化工产品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运城盐池单一无机化工产品结构已无力左右中国的无机化工产品市场，而且随着盐池芒硝资源的日渐枯竭，化工产品这种资源性产品也不可能长久保持优势。打破单一无机化工产品结构，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就成为运城盐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针对运城盐池拥有生产洗衣粉的原料优势（即元明粉是洗衣粉的主要原料），且洗衣粉附加值较高这种情况，1992年4月，运城盐化局租赁了濒临破产的原运城洗涤厂，改名为运城盐化局日用化工厂，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生产，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即“奇强”牌。至1994年底，产品主要有三种，即“奇强洗衣粉（普通）”、“奇强增白加香洗衣粉”和“奇强加酶洗衣粉”。接着又陆续研制开发出“奇强速效洗衣粉”、“奇强高级洗衣粉”。1998年8月，“奇强加酶加香增白洗衣粉”又投产上市。至此，运城盐化局生产的洗衣粉共六个品种和26个不同规格。除了固剂洗衣粉外，还有液剂“奇强洗洁精”，产品分普通和速效两种及4个不同规格。这些产品产量质量均完全符合国家GB/T·13171-1997标准。

1996年4月，南风集团出资180万元，着手对原洗衣粉第一车间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使第一车间洗衣粉年生产能力由3万吨增至5万吨。同年又出资220万元，对原第二车间设备进行改造，使第二车间洗衣粉年生产能力由5万吨增到7万吨。自此，洗衣粉年产量达到15万吨以上^①。

（3）运城“盐池资源”特色旅游业的兴起

随着国内芒硝矿产资源的不断发现和开发，运城盐池的化工业资源开发的优势将日趋减弱，在对新发现的矿藏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确保化工产品市场优势的同时，南风集团在受到世界著名旅游胜地以色列死海的启发后，决定将旅游业定位于盐池的换代产业。

南风集团请北京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对盐池的水质和泥质成分试样进行了检测和试验，结果表明，虽然与死海相比，运城盐池面积只有其1/9，但与死海同样是内陆咸水湖，湖底同样有富含矿物质的黑泥，且运城盐池黑泥与以色列死

^① 运城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海黑泥中有益于人体的矿物质均在同一数量级上，且为无毒，无刺激性物质。为此，2001年南风集团决定实施“中国死海”计划^①，准备3年见规模、5年成气候，大致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盐湖修整，其中包括度假村式的四星级酒店和浴场、重点古迹的修复及凤凰谷风景区的开发；第二步是黑泥化妆品的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及合作伙伴，建立继以色列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黑泥化妆品基地；第三步则是通过盐池带动运城市旅游产业整体升级。

目前，南风集团已经投资1000万元恢复了池神庙等古建筑，在盐池的正中心开辟了占地100亩的黑泥洗浴和盐水漂浮浴场——中国死海运城盐池瑞莱斯漂浮浴场，和建筑面积达5500平方米的集漂浮、泥疗、静养、洗浴于一体的黑泥康体养生城，并依中条山势建设了凤凰谷森林公园以及与此匹配的各种旅游度假村和宾馆饭店，同时计划建设人文景观——唐代铲盐畦，再现唐代人力下田采盐的情景。另外，南风集团凭借盐池丰富的矿物资源和多年生产日化、化工的经验，对其附加产品进行了全方位的开发。现已经开发出了黑泥浴皂、洗发水、沐浴露、体膜系列润肤化妆品等，且已推向市场。

^① 王乐义：《南风集团实施“中国死海”计划》，《南风周报》2001年第3期。

二、百年盐业与运城地方社会

运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盐务专城，始建于元朝，“元末，运使那海德俊筑凤凰城以资保障，而运治始立，名曰运城。”^① 运城之所以能够作为盐务专城而建立，有赖于盐业经济的繁荣，前人记载道：“河东何以独有专城……盖秦、晋、豫三省商民群萃一城，每患地小不足以容，城之特建，势使然也”^②。盐务专城的设立和盐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运城地方社会。

（一）盐业与运城社会经济

20世纪盐业极大地影响了运城地方的社会经济，不仅构成了运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推动了运城多种产业的发展。

1、盐业为各历史时期运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19世纪末至抗战前夕，运城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和盐税。关于田赋，《运城市志》记载了其9个年份的田赋征收数量：

表7 民国至抗战前夕运城田赋征收情况^③

单位：银元

年别	1915	1918	1920	1921	1923	1925	1928	1932	1934
田赋	194000	206000	150000	208000	180000	176854	254310	187209	208300

从表7可知，此期的田赋征收数量比较稳定，1915—1936年，运城田赋征收大抵维持在每年19—20万银元的数量。

盐税征收数量仅次于田赋。运城盐池每年要上缴数额巨大的盐税，其中有少量部分预留给运城地方财政。以民国时期为例，1914—1919年，运城盐池共上缴盐税1852万元，其中总额的94.9%上缴给了五国银行团，仅有5.1%，也就是94.45万元划归给运城地方财政，平均每年15.74万元。此后，运城盐池的税率还有增长，从1925年起，每担盐税增加3.2元，1936年增加到5.117元，盐池上缴给运城地方财政的盐税也随之增加。通过和田赋的比较可知，从19世纪末到抗战前夕，运城盐池每年上缴的盐税仅次于当时第一大税种—田赋，成为运城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运城的盐税和田赋征收被纳入战时轨道，运城地方财政收入几乎年年亏空。新中国建立后，运城财政收入的来源是工商各税、盐

^① 《河东盐法备览》卷二

^② 《河东盐法备览》卷二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2—285页。

税和农业税。工商各税包括工商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盐税则包括食用盐税、农牧业用盐税和工业用盐税。1949年到60年代初期，盐税成为运城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关于此期运城税收情况见下表：

表8 运城市各项税收完成情况(1951—1962年)^① 单位：元

年别	农业税	盐税	工商各税	年别	农业税	盐税	工商各税
1951	1601200	1258520	2620700	1956	3479000	3906263	530775
1952	1537500	2729961	2046000	1959	2743900	8349812	7271447
1953	2246600	5272350	2586900	1961	1759300	9647637	5425152
1954	3244200	5443059	3129500	1962	1923900	8064439	4834195
1955	3286700	4076151	613402				

1951—1962年，运城各项税收总额累计达到12636万元，其中农业税3074万元，占税收总额的24%；工商各税4687万元，占税收总额的37%；盐池税收4875万元，占税收总额的39%。盐池税收征收数量大于工商各税和农业税，成为运城第一大税种。

1963—1977年，盐税在运城财政收入中仅次于工商各税。1963年，运城工商各税征收数量为5847413元，首次超过当年盐池税收，成为运城第一大税种。但是盐池税收对运城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仍然是很大的，此期运城完成各项税收情况如下表：

表9 运城市各项税收完成情况(1963—1977年)^② 单位：元

年别	农业税	工商各税	盐税	年别	全年税收	工商各税	盐税
1963	2391900	5847413	3177881	1971	2229700	7488479	5099641
1964	2391600	6479626	4185655	1973	2452700	9498671	5272893
1966	2210700	6425840	4336449	1974	2348000	8419174	6037432
1968	2451300	5374981	5507450	1976	2452700	10043000	6594225
1970	2306900	7088662	6080347	1977	2339700	11814501	8845507

此期，运城各种税收总额累计达到21646万元，其中农业税3545万元，占税收总额的16%；工商各税10131万元，占税收总额的47%；盐池税收7970万元，占税收总额的37%。盐税的征收数量虽少于工商各税，但却远远大于农业税的征收数量，仍为运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促使运城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工商税的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9页。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9页。

征收数目急剧增大，而盐池税收则相对保持稳定，但盐池税收在整个税收中所占比率仍然很大。据统计，从1977年到1990年，运城累计税收总额近3.72亿元，其中光是盐池税收就达到386.83万元，占运城地方财政收入的10%^①以上。

总之，百年盐池税收在各个时期运城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几经变化，但即便是在所占比重最小的时期，它对运城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仍然超过10%。所以说，盐业税收是百年运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盐业经济推动运城多种产业的发展

19世纪末期，运城盐业因为繁重的外债摊额而一度衰落，但到民国初年，由于河东临时盐政处和盐务稽核分所采取了一些恢复盐业产销的措施，运城的盐业经济又再度兴盛起来。如前所述，此期的运城盐业不论从生产规模还是从行销区域上看，都超过了19世纪末的水平。盐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运城商业、金融业发展，逐渐形成了以盐业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系。

首先，盐业资本对商业的渗透。1918年，运城盐池三大盐业资本家除主营盐业以外，都纷纷投资商业。比如姚长盛兼营绸缎庄和杂货铺，刘集成兼营一家木材公司，卞和兴兼营布匹和染料生意等。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军阀混战，平汉、陇海铁路中断，芦、淮盐销路受阻，运城盐在河南的销售量激增，盐价大涨，运城盐业资本家获利极为优厚，纷纷投资运城的油店、酒店、绸缎庄和钱庄，如运城盐商尼奎亭就成为了当时最大的绸缎庄一祥瑞奎的最大股东。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盐业资本家都是运城商业的主要投资者，根据《运城市志》记载，“民国22年（1933年），运城有商店356家，资本44.02万元，从业人员2190人，其中，惟盐商居多。”^②。盐业资本对商业的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盐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运城金融业的发展。运城最早的两家政府金融机构的设立都和盐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是“运库”，于光绪年间为征收盐税而特别设立，宣统元年（1909年）后为“筹办海防、赔偿外国贷款以及普通加价，连同原额征银共计白银113.05万两”^③。“运库”一直维持到民国初年。二是中国银行运城分行，民国3年（1914年）成立，从属于河东盐务稽核分所，目的也是为了方便监督、解交运城盐税。1914—1919年运城盐税总额的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9页。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1页。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3页。

94.9%都要经由中国银行山西分行交给五国银行团。

盐业经济也推动了运城私人钱庄的发展。到1935年运城共有钱庄6家，1936年增为8家^①。运城钱庄的主要贷户便是盐业。当时全省资本最为雄厚的钱庄为运城兴业钱局，它的主要放贷对象便是刘增盐场、西安盐店、壶关盐店和平陆盐店。另根据《运城市志》统计，1934年，运城钱庄共放贷62.31万元，其中，盐商贷款占65%。1936年，运城钱庄共放贷66.942万元，其中盐商贷款就达到55.742万元^②。由此可见，盐业经济是运城钱庄的主要支撑。

从1938年3月日军攻占运城一直到1948年运城解放，在这段时期内，日伪和阎锡山把运城食盐产销纳入战争轨道，切断了盐业与运城地方社会的联系。不仅盐业经济濒临破产，运城的各项经济、社会事业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日军侵入运城后，实行强化治安，经济封锁，对产品实行配给，运城的私营商业纷纷破产、停业，市场一片萧条。如前所述，1933年，运城有商店356家，从业人员2190人；到1940年，运城商号仅存68家，从业人员278人^③。同时，金融机构也遭受重创，1936年，运城共有钱庄8家，但到1948年运城解放之前，除兴业钱局外，均已停业；另外，日军侵入运城后，大多数政府金融机构也相继停办，如山西省银行运城办事处、晋绥地方铁路银号运城分号、裕华银行运城支行都在1938年倒闭。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8年运城盐化局组建以来，不仅盐池化学工业逐渐发展壮大，还有力地推动了整个运城化学工业的全面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初，运城化工企业都集中在盐池内部，数量不多。1949年，运城只有“国营芒硝公司”一家化工企业，1951年发展到3家；1952年，运城共有8家化工厂。1958年，运城盐化局成立以来，带动了运城一大批化学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当时运城主要的化工厂如解州化工厂、运城洗涤剂厂、席张化工厂、运城洗衣粉厂的建立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运城盐化局的原料供应和技术支持。改革开放之后，运城化学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以上四家化工厂先后并入运城盐化局，此外，在盐池周边县市，还涌现出大批的化工企业。1983年，运城地区的化工企业已经达到59家，1988年，超过100家。这些企业以生产化肥和农药为主，而制造化肥和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2页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2页。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94页。

农药的必需原料（钾盐和砷盐）都要从运城盐化局获得。

随着化学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化工产值在运城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渐上升，据统计，1952年、1957年、1965年、1970年和1975年，盐池化学工业产值分别占运城工业产值的6.3%、7.3%、8.5%、11%和15%^①。改革开放以来，盐池化工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化工产值在运城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显著增大，从1981年开始，就一直稳定在20%以上。根据《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统计，1981—1988年，盐池化学工业分别占到运城工业总产值的20.2%、20.8%、22.0%、23.0%、20.5%、20.3%、22.0%、23.0%^②，以运城盐化局为龙头的化工产业已经成为运城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盐池资源旅游也促进了运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运城旅游业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运城只有池神庙、关帝庙、舜帝庙等少数旅游景点。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运城加大了旅游业开发投入，先后建成旅游景点55个。而运城盐池以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在运城旅游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经建成以瑞莱斯浴场为核心的“中国死海”休闲区、以池神庙为主体的盐文化展示区、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旅游风景带。其中，“中国死海”休闲区被评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区”和“山西省第六大旅游目的地”，成为发展运城旅游业的重中之重。

3、池神崇拜与庙会经济

庙会即运城地方的定期集市，每年庙会期间，都有大规模的商品物资交流。庙会经济源于“池神崇拜”的古老风俗。池神是运城盐池的保护神，唐大历十二年（777年），运城盐池“红盐自生……形攢伏虎，色泐丹砂，灵祝休徵，古未之有也”^③。因为红盐被视为“祥瑞之兆”，所以唐代宗封池神为“灵庆公”，并修建池神庙。宋代，盐池又流传着“关羽战蚩尤”的传说，蚩尤为祸盐池，关羽将之打败后，“池水如故，而盐复生，人争感而与池神复祀”^④，关公因“有功于盐池”，所以宋代又修建关帝庙以供祭祀。每年农历8月15日，食盐生产完场，各号掌柜都要聚集在池神庙或者是关帝庙里祭祀池神、演戏、宴客，以感

^① 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1987年印刷（内部发行），第95页。

^② 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1987年印刷（内部发行）第95页。

^③ 《河东盐法备览》卷十二

^④ 《河东盐法备览》卷十二

谢池神的庇护，并祈祷下一年的丰收。人们这种定期在池神庙和关帝庙举行的祭祀活动，就是早期的庙会。

19世纪末期以来，运城庙会逐渐发展，由单纯的祭神发展成为集市。当时的主要庙会有鸣条岗舜帝庙会、解州关帝庙会、吕祖庙会、从善蚩尤庙会、金井庙会等，其中除关帝庙会和蚩尤庙会具有较强的祭祀色彩外，其他的庙会多以商品物资交流为主。20世纪初，庙会的祭祀色彩日益淡化，经济功能逐渐加强，到了20世纪30年代，关帝庙会和蚩尤庙会也不再举行祭祀活动了。到了1948年，运城共设庙会11个，全部是物资交流大会。其中城关庙会交易的主要品种是蔬菜、布匹，粮食和牲口，赶集人数一般2000余人。北相镇的舜帝庙会以牲畜为主，每集为70余头左右，成交20头上下，粮食上市百十石，成交四、五十石，每会也有2000余人。东郭庙会主要是牲畜、粮食交易。泓芝驿、陶村、王范、冯村、张董、三路里、上郭的庙会，主要是蔬菜、粮食交易^①。

1949年以后，运城庙会种类逐渐增多。据《运城市志》记载，1949年，运城的主要庙会有社东村风后庙会、曹村闾阳驾会，泓芝驿农具会，半坡黄瓜会，从善村大蒜会、霍赵村甜瓜会、陈村菜会、汤里村萝卜白菜会、西里庄红枣会、舜帝庙会、南庙古会，苦池儿女外甥会、关帝庙会、席张古会、张良古会等22处庙会。从交易内容看，仍然以农副产品、牲畜、农具等为主。1966年，在“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口号中，运城古庙会全部关闭，集市贸易被彻底取消。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运城盐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庙会经济也逐渐恢复，1979年恢复古庙会8个，组织6次物资交流会，成交金额367万元；1980年，恢复古庙会12个，组织物资交流会5次，全年庙会交易额达到567.4万元；1984年，运城共有庙会22个，举办物资交流会11次，庙会交易额为1512万元^②。

1990年，运城举办的“运城关公庙会”，规模空前，设有8大市场，即商业供销市场、物资市场、粮油市场、地方产品展销市场、外贸产品展销市场、农副产品产销市场、名吃市场、旅游市场。到庙会第6天，八大市场销售额达到1035.64万元，其中物资市场销售量最大，销售额达到313万元，商业市场次之，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7页。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38页。

销售额达到 254 万元，旅游市场接待游客 22607 人，平均每天近 4000 人前往关帝庙、盐池池神庙等景点旅游。据统计，此次庙会销售总额达到 1435.8 万元^①。

（二）盐业与运城社会公益事业

19 世纪末以来，运城的社会公益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设立了众多慈善机构，对社会流散、孤贫、疫病等穷苦百姓、盐池工人进行救济，并对轻罪囚犯传授技艺。主要慈善救助机构如下表。

表 10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运城主要慈善机构^②

名称	牛痘局	同善义园	养病所	同善局	工桑园	习艺所
创立时间	1879 年	1892 年	1889 年	1892 年	1906 年	1906 年
创立目的	防止天花 流行	储备粮食 以备灾荒	医治盐池 工人疫病	处理暴毙 街头贫民	安置游民 发展农桑	教养轻微罪犯 学习手工技艺

举办这些慈善机构需要大量的经费开支，其经费来源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官府筹措。比如同善义园“为光绪 18 年（1892 年）河东护道吴洪恩筹款修建，购地三十四亩以益之”^③；习艺所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为河东道陈际唐筹款成立。收轻罪人犯，使之学织毯、袋等物。一经限满释回，不至于游惰。”^④牛痘局则是“光绪五年（1879 年）江浙賑局解银捐助”^⑤。

第二，官员捐赠。比如办养济园时，“河东道金应琦捐银 72 两，前运使郭一裕捐银 400 两”^⑥；办育婴堂时，“河东道李百令捐银 2300 两”^⑦。

第三，盐商摊捐。在政府提倡和带头捐赠的前提下，盐商自愿捐款或是被迫接受摊派，这是清末运城慈善事业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比如同善局是由“运城绅商劝感河东道杨保丞敛埋暴露，知为善举，遂踊跃捐资”^⑧而成立；举办养病所的经费，“每年先有道库提银三百两，不敷多寡，悉由各（盐）商认筹”^⑨。所谓“认筹”，实际上是对盐商进行摊派。同善局的经费也是“劝各盐商……捐”^⑩。粥厂的经费开始是募捐，后由于“旋恐临时捐募，难期经久，遂令盐商，每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239 页。
^② 柴继光：《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7—151 页。
^③ 《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
^④ 《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
^⑤ 《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
^⑥ 《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卷一·运治门·恤政
^⑦ 《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
^⑧ 《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卷一·运治门·恤政
^⑨ 《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
^⑩ 《续增河东盐法备览》卷上

掣盐一名（计量单位，一名约计 28800 斤）各捐银一钱五分。由是经费有常，经久不倦。”^① 这是按秤放的盐斤数量而饬令盐商捐纳的银两，很明显是硬性摊派，不管愿意与否，盐商都得交纳。此外，还有牛痘局、仓储（官仓和商仓两种，分别担当济贫和对坐商资助调节的任务）等都多由盐商长期资助。

以上三种经费来源中，地方政府筹措是少量的，官员捐赠也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两者大都是一次性的，“临时捐募，难期经久”。只有盐商承担的经费才是主要的，而且多是按年缴纳，长期负担的费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的运城公益事业是以运城盐池盐商的经济资助为基础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慈善机构全部停办。

新中国的建立和运城地方人民政府的建立，使社会公益事业再次发展起来。首先是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立。运城民政局统一管理社会慈善救助机构的设立和运营，所设立的主要慈善救助机构有：残老养育院（1949 年设立，专养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运城地区光荣院（1965 年建立）、福利公司（1979 年建立，主要是为残疾人员安排就业）等等。此外，各乡镇敬老院也迅速发展起来。1983 年，五龙峪乡、南扶村、席张乡、东郭镇先后办起敬老院。到 1988 年底，全运城市共有 7 座敬老院，共收孤、寡老人 38 名。1990 年，敬老院发展到 19 座，入院老人增加到 92 人^②。

其次是灾害救济，1949 年，运城遭受特大旱灾，遍及 193 个自然村，当年政府救济受灾民众小麦 24750 公斤。1956 年运城水灾，受灾 12 个乡，35 个自然村，1500 户，运城市政府和民政局发放大量救济款，同时开展生产自救。

再次，对困难户和五保户进行救济。新中国建立后，运城市民政部门对孤、寡、残摸底造册，救济粮款。据 1984 年统计，运城市全年共发放补助款 8928 元。^③对临时发生灾祸的困难户，运城市民政部门也给予救济。1978—1988 年，民政部门共发放临时特别救济款 422420 元。1990 年，救济 540 户 2200 人，发放临时救济款 18660 元。

关于五保户救济，1950 年起是依靠集体供养，民政部门从社会救济款中不定期的给予补助。1983 年，民政局对运城市“五保户”对象进行审查，审定 707

^① 《增修河东盐法备览》卷一·运治门·恤政

^②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405 页。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404 页。

人，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 5 元，冬季发给棉衣和棉被。1986 年后，山区“五保户”每人每月 10 元，平川 5 元。1988 年，全市共有五保老人 288 人，全年发放救济补助款 14887 元。1990 年，全市五保老人 268 人，全年发放救济补助款 112560 元^①。

在此期间，运城的福利机构、灾害救济、困难户和五保户救济的经费来源除了主要由运城市地方政府和省民政厅划拨以外，其余来自社会募捐，运城盐化局每年都贡献了较大的份额。根据《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记载，“从 1949—1988 年，运城社会慈善募捐总额累计达到 350 万元，其中运城盐化局捐款总额累计 59 万元，占社会募捐总额的 17%”^②。

除了直接资助运城公益事业以外，运城盐化局还拿出相当数量的资金回馈社会。1989 年，国家食盐供应紧张，为保障运城的食盐供应，盐化局调出盐池几乎全部存盐，低价供给了近 40 吨食盐，解决了当年运城的食盐危机；1998 年，南风集团又捐资 1000 余万元兴建“南风广场”，成为运城市的标志性建筑；2000 年，南风集团拨款 30 万元，支援洒郊村的农业建设，先后建成机井 10 座，改造旧公路 30 公里；2002 年，南风集团启动“百万巨款献爱心”活动，当年就出资 100 万元，用于解决运城贫困学子入学问题。

（三）盐业与运城教育文化

百年盐业直接影响了运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变化。盐务专学（运学）的长期维持离不开盐商的经济资助，运学的兴盛又促进了运城教育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城盐化局通过企业办学和提供实习岗位为运城市民教育文化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庙会的举办，也促进了运城群众文化的繁荣。

1、盐业与运城教育事业

19 世纪末，运城的教育门类有两种：一为启蒙教育之社学，招收一般村民子弟；一为盐务专学—运学。“天下运司有五，惟河东有专学”^③，河东专学即是指运学。

运学是一种专门招纳盐商子弟入学，以培养盐务专门人才为目的的教育体系。20 世纪初，运学的主要书院向近代学堂转变。如河东书院在 1905 年改设为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405 页。

^② 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 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 1987 年印刷（内部发行）第 176 页。

^③ 《河东盐法备览》卷 10·学校门

河东中学堂，“为升入省城大学堂之预备”；宏运书院改名为河东初级师范学堂，“分简易、完全两科，为升入省城优秀师范为宗旨”；其他如解梁书院在1903年改为解州高等小学堂，条山书院改为安邑高等小学堂。与此同时，运城原有的启蒙教育之社学，由于“经年既久，敷衍者多”，也有所改革。“河东道吴匡在1903年合并原有社学为东西两路初等小学堂；河东道陈际唐于1906年添设中路小学堂，分延国文、科学教员，为升入高等小学之预备。”到20世纪20、30年代，运城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中级、初级教育体系。

运学的兴盛和运城盐业经济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首先，运学的成立是以“教诸商子弟”为目的，所以“必须系盐商子弟方准考试，其民籍童生不得混入冒考，民籍如有冒滥通融，则送之盐官，处分甚严”^①，就是说运学招收的学生必须是盐商子弟，其他商民子弟不在招收之列。运学作为盐商子弟学校而出现，客观上反映了运城盐业产销事业的繁荣和盐商地位的重要。其次，运学“因盐政而设”，其教学内容除了常规的儒家经史之外，还涉及到盐务管理、盐业生产、运销税制等专门知识。再次，从运学的经费来源看，除“学田”收入以外，很大一部分来自运城盐商的经济资助，诚如柴继光先生所说，“在盐务专城里设置盐务专学，学官编制、经费均有保障”^②。正是运城盐商的长期资助，运学才得以长盛不衰。

运学的兴盛促进了运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河东地区教育文化中心。同时，运学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变又形成了近代运城比较完备的中级、初级教育体系。新中国建立后，运城主要学校和运城书院也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比如运城师范学院的前身即为宏运书院；运城中学的前身是河东书院，安邑小学的前身的是条山书院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运城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各类学校数量迅速增加。据《运城市志》记载，1953年，运城共有小学150所，中学4所，中等专业学校11所；1958年，共有小学203所，中学9所，中专7所，高等专业学校3所；到了1987年，运城共有小学361所，中学46所，中等专业学校10所，高等专业学校2所；到了1990年，运城共有小学371所，中学55所，中等专业学校12所，高等专业学校1所^③。

^① 《河东盐法备览》卷十二

^② 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③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91—497页。

与此同时，运城人口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文化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据记载，民国7年（1918年），运城成人中识字的仅有9541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运城市有大学文化程度（含本科、专科）1050人，高中文化（含中专）6603人，初中文化19095人，小学文化105111人；文盲和半文盲有76922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运城市有大学程度3415人，高中34416人，初中98098人，小学168216人，文盲和半文盲有55730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共有大学文化程度10094人，高中52176人，初中156106人，小学168957人，文盲和半文盲为39192人。^①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相比，运城市每万人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大学由1982年的103人提高到205人，高中由878人提高到1060人，初中由2366人提高到3171人，小学由4057人下降为3432人，文盲、半文盲由1982年占总人口的13.73%下降为7.96%。

运城盐化局对运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盐化局实行企业办学。1949年，在运城池神庙内创办“潞盐盐务行政干部学校”，在晋南招收学员，共培养盐务系统基层干部和会计近300名。1963年，盐化局成立职工学校，参加学习人数超过2000名。除职业技术教育外，盐化局还积极兴办普通学校，1969年，成立了盐化局的子弟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校。现有567个教学班，学生5000余名，30年来，向社会输送了万余名合格学生。

2、庙会与运城群众文化

各个历史时期的运城庙会不仅促进了运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运城庙会源于“池神崇拜”的古老风俗。庙会最初只是为了纪念盐池的保护神，如灵庆公和关公，19世纪末庙会逐渐发展为集市。不管是祭祀还是集市交易，庙会期间都要举行规模较大的民间文艺演出，表演内容比较固定，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博得了运城民众的欢迎。

庙会极大地促进了运城群众文化的繁荣。首先是具有运城地方特色的社火表演。比如背高，它是盐池流传久远的民间艺术形式，一般在祭祀池神时表演。演员身上固定一根铁架子，将幼童化装成戏剧造型固定在上面，由多人抬着进行表演；高跷，演员将腿绑在木制的拐子上，化装成各种人物进行表演，并伴有锣鼓、

^①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8页。

锁呐、四弦伴奏；龙灯，表演多在夜间，跑龙人身着彩装，背负串铃，并有锁呐、锣鼓、焰火助威；花灯，演员手持两盏灯，随着鼓点跑出各种舞蹈姿势；狮子舞，舞狮人身着黑色紧身武衣，手持绣球作出各种引狮动作，以展现兽王的威武性格以及人狮搏斗的场面；此外还有划旱船、秧歌舞、锣鼓等节目。

其次，庙会期间还要举办规模宏大的焰火表演。旧时焰火多在农历二月二号池神庙前举行，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节目是“老和尚敲钟”，（老和尚隐喻盐池工头），表演在夜晚进行，先是大火猛起，击中花筒，一老和尚出门敲钟，接着火花四溅，无人救援，直到寺院全部烧毁。“老和尚敲钟”这一节目反映了盐池工人对“老和尚制度”的诅咒。民国时期，焰火表演改为铁桶施放焰花，火焰高达10多丈。因这种焰火危险性很大，以后逐渐被花筒取代。新中国建立后，焰火表演长盛不衰，几乎每年的正月十四都要在城区广场举行规模较大的焰火表演。

再次，在庙会期间还伴有曲艺表演，比如评书、快板和戏剧等。其中戏剧的许多曲目就直接取材于运城盐池。如《关公战蚩尤》取材于关公率领天兵征讨蚩尤，从而保护了盐池的神话；而《哑姑泉》则取材于哑巴姑娘战胜盐池牛怪的神话等等。

百年盐业除了促进运城教育事业和群众文化的繁荣之外，还留下了许多有关盐池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其中最有名是三组长诗《长工叹》、《工人乐》和《工人欢》。《长工叹》记载了盐工的身世、辛苦的劳作、工头的打骂和盐工自发的反抗，1949年之前曾在盐池广泛传唱。《工人乐》和《工人欢》则作于运城盐池解放后，主要内容是歌颂盐池的巨大变化和广大盐池工人的主人翁精神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著名文人也留下了许多诗歌或散文作品。比如著名剧作家田汉于1961年参观运城盐池后作有《赞‘哑姑泉’》诗。郭沫若1965年到盐池参观后，也作诗对盐池的食盐生产和化学工业进行歌颂：“唐代曾封灵庆公，盐池古海用途宏。阳光充炭成银岛，硫钠提纯化尼龙。非有神祖作主宰，乃缘人力代天工。禁城谁禁城犹在，忆苦兼堪御北风。”此外还有张志得的《解州之春》、李竹林的《池神庙前话池神》、金嘉梅的《盐池赋》、张波峰的《盐池新姿》等等。这些文艺作品呈现出运城盐池文化的特色。

三、百年运城盐业的发展趋势

百年运城盐业形成了一条既区别于中国海盐、井盐区，又区别于其他池盐产区的独特的发展之路。挖掘出其中几条主要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百年运城盐业的历史。

（一）“以食盐为主”观念的淡化

在 20 世纪运城盐业史上，“以食盐为主”的观念曾经严重地制约了盐池化学工业的发展。早在清代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运城盐池的主要 4 种物产：即潞盐、芒硝、太阴铉精石（龟背石）、叶生蒲黄。但是直到解放前，后三种资源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虽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曾经在盐池兴办化学工业，开发利用盐池化工资源。如盐场主杜衡和实业家曹焕文的改革等。但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盐池依旧维持着单一的食盐生产，而化学工业仍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时期，“以食盐为主”的观念对盐池化学工业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为了不削弱食盐生产的主导地位，运城盐化局确定芒硝为盐池的副产品，可以采制但不能影响食盐的生产。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不设芒硝专产机构，由各盐场兼制；生产芒硝需向主管部门申报，不得私自生产，不得超量生产。1958 年，化工生产已经开始动摇了食盐的单一主产品地位，如无水芒硝产量为 152548 吨，几乎是当年食盐产量 45713 吨的 3 倍之多，但它仍被看作盐池的副业而屡受限制。

“以食盐为主”生产观念是以传统制盐手工业为基础的盐业经济所孕育的观念，是在盐池长期的产盐历史中自然形成的：第一，运城食盐生产历史悠久。近四千年的单一生产食盐的历史强化了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认识，即盐池应当以生产食盐为主。第二，在整个古代历史时期，食盐生产能力和需求都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运城盐池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食盐，供应社会，给人一种“河东潞盐，千古不竭”的印象。第三，运城盐池的食盐资源较容易开采。早期是“天日曝晒、自然结晶、集工捞采”，唐代后出现“垦畦浇晒法”，人工垦畦，天日浇晒。不费晒制工本，坐收自然之利，较之于其他资源的开发更为方便，且生产成本较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盐化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芒硝生产，“以食盐为主”的观念已经有所淡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盐化局组织了多次专门会议认

真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多次讨论，盐化局广大干部职工认清了继续从事食盐生产所面临的不利局面和发展化学工业的巨大空间。经过全厂的大讨论，盐化局终于果断地作出了终止食盐生产的决策，将化学工业确立为盐池的主导产业。如前所述，从80年代开始，盐池化学工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切是和“以食盐为主”观念的淡化是分不开的。

（二）单一食盐生产到多元化产业结构

运城盐池有近四千年的食盐生产历史，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运城盐池的食盐生产便逐渐萎缩。1985年8月，运城盐化局向国家轻工业部盐业总局提出终止食盐生产的申请，并获得了同意。自此，运城盐池食盐生产不再纳入国家计划，由盐化局自行安排。

同时，盐池化学工业迅速发展起来。1948年，国营芒硝公司因陋就简生产出无水芒硝和硫化碱两种化工产品。1958年盐化局组建后，越来越多的化工产品投向市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化工业逐渐取代食盐生产成为盐池的主导产业。1992年运城盐池在进一步发展无机化工业的基础上，又开始引进洗衣粉生产线，走上了发展日用化工之路。20世纪末，南风集团又决定将旅游业确定为盐池化工业的换代产业。

目前，运城盐池生产的三种主导产品：元明粉（99%无水芒硝）、硫酸钾（钾肥）和奇强牌洗衣粉年产量分别达到90万吨、16万吨和33万吨。在国内市场中所占份额分别为20%、25%和48%^①。运城盐池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无机盐生产基地和洗涤剂生产基地，而由它开发的“中国死海”旅游休闲景区也被评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景区”。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运城盐池仍将保持“无机化工、日用化工、旅游业”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产业格局。

这种产业格局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运城盐池蕴藏的盐业资源非常有限，并且开发不平衡。如前所述，运城盐池氯化钠储量为1472万吨，硫酸钠储量为5915万吨，硫酸镁987万吨。长期单一生产食盐的历史必然导致运城盐池氯化钠资源的枯竭。到20世纪80年代，运城盐池的氯化钠储量已经无法满足大规模食盐生产的需要了，与此同时，硫酸钠和硫酸镁资源长期以来并没

^① 柴继光：《运城盐池解放后50年的变迁》，《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因此，运城盐化局根据盐池自身资源状况，决定缩减食盐产量，发展盐化工产业。

其次，从市场条件来看，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沿海地区的海盐、四川的井盐、西北地区的池盐都得到相当的发展，产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提升，运销也更为方便，运城食盐的产销明显处于劣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的食盐市场基本饱和，运城盐池再坚持食盐生产已没有多大的经济意义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到 60 年代，国家大力发展化工业，化工基础原料产品市场紧缺，这给运城盐池化学工业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运城盐化局抓住了发展化工业的大好时机，不断地改进生产工艺、更新生产设备，从而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再次，90 年代，盐化局综合考虑盐池资源和市场状况，决定开发日用化工产品和旅游业。运城盐池主要的无机化工产品如元明粉（99% 无水芒硝）和硫酸钾的生产，资源消耗率高，产品附加值低。这种高资源消耗型的产业必将加速盐池资源的稀缺，并且从长远看，也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打破单一的无机化工产品结构，开发低资源消耗型的日用化工产品就成为运城盐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另外，运城盐池蕴含的“黑泥”资源和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为发展盐池旅游业奠定了基础。

运城盐业在调整产业格局方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就在运城食盐生产逐渐萎缩的同一时期，全国食盐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却在迅速扩大。据统计，在“六五”期间，国家共完成食盐生产固定资产投资 4.404 亿元，在“七五”期间则猛增至 21.9366 亿元，共兴建了 8 个大中型食盐生产项目^①。而在八五期间，四川川东盐厂，云南昆明盐矿，河南平顶山盐厂重点建设项目也相继建成投产。随着盐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食盐产能稳步提升，据统计，“六五”末的食盐生产能力是 1905 万吨，到了“七五”末，产能达到 2475 万吨，八五末达到 3800 万吨^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大盐区都走上了一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道路。它们在坚持食盐生产不动摇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例如江苏省将食盐生产和海产养殖结合起来，一方面致力于提高食盐的产量和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开发对虾养殖，1987 年对虾养殖面积达到 45 万亩，对虾产量突破

^① 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06 页。

^② 程龙刚：《新中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盐业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3000 万吨，实现利税上千万元^①。在内蒙古池盐产区，吉兰泰盐化集团则尝试大面积养殖盐藻，并从盐藻中提取 β-胡萝卜素成功，目前在吉兰泰已经建成年产 500 公斤的生产基地，为盐田生物技术开发展现了良好的前景。江西盐业公司则把生产精制盐和塑钢制品作为主导产业，其下属的富达实业公司虽然仍以食盐定点为主，但它的塑钢产值已经超过主业，成为江西最有影响力的塑钢企业。

总之，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方面，中国其他盐区基本是以盐为主，兼营其他产业；而运城盐业则果断地缩减甚至终止了食盐生产，逐渐形成了“无机化工、日用化工和旅游业”的现有产业格局。

(三) 运城盐池不断调整和优化资源利用方式

运城盐池是三百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地质遗迹，它所蕴藏的氯化钠、硫酸钠、硫酸镁等盐类矿体都属于不可再生性资源。随着对这一认识的逐步深化以及技术创新的不断实现，百年运城盐池的资源利用方式也经历了从单一性开采到综合性、保护性开发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过程。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运城盐池主要盐业资源的开发存在明显的单一性，并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首先是单一开采氯化钠，导致硝板的长期废弃。19 世纪末以来，运城食盐生产仍沿袭传统的生产工艺：吸取湖表卤水晒制食盐。灌入结晶池的卤水中含有大量的氯离子、钠离子、镁离子和硫酸根，在卤水晒制的过程中，不仅结晶出食盐，还有硫酸钠和硫酸镁的复合物（俗称硝板）。但是长期以来，只从卤水中单一地提炼食盐，而把硝板废弃了。其次，单一开采硫酸钠，导致镁盐富集。运城盐池生产芒硝主要是从天然硝板中提取硫酸钠，由于芒硝生产工艺中没有消除镁盐的设施，造成几十年来只开发硫酸钠，而忽视了对镁盐的开发，致使盐池卤水中富积了大量的镁盐，对芒硝质量和产量的影响越来越大。从长远看，甚至会使得芒硝不能结晶出来，成为盐池“镁害”。同时，单一性开采还加速了运城盐池氯化钠和硫酸钠资源的枯竭，在 80 年代，运城盐池氯化钠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大规模食盐生产的需要。而硫酸钠资源储量，据 1987 年山西省 214 地质队提交的《山西运城盐和盐类矿床详勘储量报告》“从现有生产能力推算，估计尚可使用 5—10 年”^②。

^①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2 页。

^② 程荫东：《运城盐湖综合利用的战略构想》，《山西煤化工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8 页。

20世纪80年代，运城盐业对资源进行综合性和保护性开发。首先，开发镁盐、钾盐和钡盐。80年代，盐池开始开发镁盐，除金属镁以外，还生产阻燃剂、一水精制硫酸镁和七水精制硫酸镁等一系列镁盐产品。90年代又生产出硫酸钡，目前南风集团53吨精细钡、专用钡改造项目已经建成投产。关于钾盐的开发，1989年开始室内实验生产硫酸钾，1990年研制成功，创造出以芒硝和氯化钾为原料生产的新工艺。1994年在盐化一厂建成年产硫酸钾1万吨的生产车间。1996年另一套年产硫酸钾5万吨的生产项目也建成投产，目前南风集团已形成年产16万吨硫酸钾的生产能力，占到全国硫酸钾市场的25%^①。

其次，卤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卤水是生产芒硝、硫酸钾、硫酸镁等多种化工产品的母液，但长期以来，资源只利用一次，造成了很大浪费。90年代末，盐池开始着手对母液的循环利用。在芒硝晶体析出后，根据化验结果决定母液的去向，若母液中钠离子的浓度大于或者等于34%就返回贮卤池中，反之就排放掉，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高浓度母液的再利用。

再次，改进生产工艺，减少资源浪费。以无水芒硝生产工艺为例，初期是“土法上马”，用简陋的铁锅提炼卤水，资源利用率极低。到80年代，设计出“四效蒸发和末效二次蒸汽废热利用工艺”，这一工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极大地提高了卤水利用率，减少了资源浪费。

最后，开发低资源消耗型产品。运城盐池主要产品如无水芒硝和硫酸钾等多为初级产品，科技附加值低，资源消耗率高。所以，从90年代开始，盐化局决定将芒硝资源投向科技附加值较高、资源消耗较低的日用化工产品的生产，引进洗衣粉生产线。21世纪初，南风集团开始向高科技领域进军。2001年，南风集团与清华大学合作推进纳米技术产业化，开发了“15 kg/每小时碳纳米批量生产技术”，极大的提高了运城盐池资源利用率。目前，南风集团正在加大对盐池旅游资源开发的力度，对盐池进行全面治理和保护，逐步加快实现运城盐业由资源消耗型经济向资源节约型经济的转变。

^① 柴继光：《再造辉煌—运城盐池解放后50年的变迁》，《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4期。

结束语

20世纪运城盐业的历史围绕着中国政局的变动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清末不平等条约与运城盐业；丁恩“盐务改革”前后的运城盐业；日寇与地方军阀对运城盐业的掠损；新中国运城盐业的发展。1949年之前，运城盐业虽然在某些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最终没有避免继续衰败的命运。这主要是因为此期运城盐业的统治机构是从搜刮盐池财富、加大税收出发，对盐池实行了涸泽而渔的统治方式。

运城解放和新中国建立以后，运城盐业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食盐生产在暂短的恢复之后，便逐渐萎缩。而运城盐池的化学工业却迅速发展起来。1985年，运城盐池果断地终止了食盐生产，而代之以化工产品的的全面开发。改革开放以来，运城盐池开始了日用化工产品的开发。20世纪90年代初又把旅游业作为自己的换代产业，从而形成了“无机化工—日用化工—旅游业”多元化的产业格局。

运城，即是因为盐务运输而设立的专城。百年盐业对运城地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盐税是20世纪运城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1951—1962年，盐税曾一度跃居运城第一大税种。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运城各种经济的迅速发展，税源不断扩大，盐税收入仍占运城地方财政收入的10%以上。其次，盐业经济推动了运城其他产业的发展。19世纪末至抗日战争时期，运城形成了以食盐产销为核心的商贸体系。1949年之后，盐池化工业推动了运城化工业的发展，而盐池旅游业则带动了运城旅游服务业的发展。再次，庙会经济也极大的丰富了运城民众的经济生活。古老的池神（灵庆公和关公）崇拜的习俗在运城地方形成了各种庙会。20世纪以来，庙会又逐渐具有了定期集市的性质，包括各种农副产品、牲畜、农具等的交易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庙会经济的规模日渐扩大，交易商品种类也逐渐增多，发展成为大型的物资交流会。

清末以来的运城社会慈善事业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盐商的经济资助。在慈善事业的三种经费来源（政府筹措、官员捐赠、盐商捐摊）中，盐商捐摊是最主要也是最稳定的经费来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日寇和军阀的掠夺，运城盐业濒临破产，盐商疲敝，原有各种慈善机构全部停办。新中国运城盐化局和后来的南风集团再度成为运城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资助者，不仅积极资助化局和后来的南风集团再度成为运城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资助者，不仅积极资助

各种福利机构的运营，而且成为运城地方灾害救济、困难户救济和五保户救济经费的重要募捐者。

20 世纪初，运城教育由运学向较为完备的中级、初级教育体系转变。新中国运城盐化局实行企业办学，推动了运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运城也形成了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另外，百年盐池传唱的诗文歌赋也成为了运城重要的文化资源。

尽管百年运城盐业的变迁几经曲折，但其中的发展趋势仍是清晰可辨的。在生产观念上，表现为“以食盐为主”观念的淡化。这一观念曾严重阻碍了运城盐池化工业的兴起，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以后，“以食盐为主”的传统生产观念才改变。在产业格局上，盐化局果断地终止了食盐生产，代之于化工产品和“盐池资源”特色旅游业的开发，逐渐形成了“无机化工—日用化工—旅游业”的多元化产业格局。在资源利用方式上，则由单一性、掠夺性开采转向盐业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综合利用。

目前，以运城盐化局为主体的南风集团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生产无机化工产品、日用化工产品两大系列产品，集科研、生产、内外贸易于一体的国有大型化工企业和中国唯一的“死海”旅游区。我们期待着运城盐业在运城市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祝愿今后运城盐池能够一路走好。

参考文献

著作部分

- 蒋兆奎：《河东盐法备览》，1790年刻本
- 江人镜、张元鼎：《增修河东盐法备览》，1882年刻本
- 姚楷：《续增河东盐法备览》，清宣统年间刻本
-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
- 盐务稽核总所：《二十五年盐务稽核总所初步年报》，1934年，国家图书馆馆藏
- 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
- 南京财政部盐务署：《盐务公报》，1937年，国图影印本
-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 田秋野、周维亮：《中华盐业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 丁长清、唐仁粤：《中国盐业史》（近代当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 唐仁粤：《中国盐业史》（地方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 丁长清：《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
- 钟长永：《中国盐业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 林建宇：《中国盐业经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 郑喜玉、张明刚：《中国盐湖志》，科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 张彭熹、张保珍：《中国盐湖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 轻工业部制盐局：《盐业资源综合利用资料汇编》，轻工业出版社，1958年版
- 盐务稽核总所：《中国盐政实录》第4辑，山西省图书馆藏
- 《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 山西省运城行署统计局：《运城地区建国四十年统计资料（1949—1988年）》，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1987年印刷（内部发行）
- 中共党史研究室：《日军侵华罪行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版
- 运城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地区志》，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
- 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中共晋南地委调查研究室等：《银湖春光》（内部发行），1961年版
- 柴继光：《运城盐池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柴继光：《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李建昌：《官僚资本与盐业》，三联出版社，1963 年版
- 董振平：《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盐务政策研究》，齐鲁书社 2004 年版
- 轻工业部制盐工业局：《盐业资源综合利用资料汇编》，轻工业出版社 1960 版
- 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百春良：《盐业经营学》，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论文部分

- 曹焕文：《西北盐池综观》，《北方经济》1940 年第 10 期
- 缪秋杰：《经济建设与盐业建设》，《盐务月报》1942 年第 6 期
- 曹焕文：《西北盐池首魁运城盐池》，《北方经济》1946 年第 11 期
- 彭泽益：《盐业与盐业史研究》，《盐业史研究》1986 年第 1 辑
- 高世扬：《运城盐湖制盐工艺过程及其制盐史的研究》，《盐湖研究》1997 年第 3 期
- 王玉萍：《运城盐湖芒硝生产工艺探讨》，《中国矿井盐》2004 年第 1 期
- 李永康：《河东盐池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沧桑》，1997 年第 3 期
- 钟长永：《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
- 程龙刚：《新中国盐业管理体制 50 年回眸》，《盐业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 柴继光：《运城盐池解放后 50 年的变迁》，《盐业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
- 柴继光：《运城盐池旅游资源概况及开发前景》，《化工矿产地质》第 17 卷第 2 期
- 柴继光：《运城盐池与河东文化》，《盐业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 李春风：《抗战时期日本对山西盐资源的掠夺》，《晋中师专学报》1999 年第 3 期
- 宣之强：《中国盐矿资源与盐化工区研究》，《盐湖研究》1996 年第 4 卷
- 王守祯：《做大旅游产业是运城富民强市的大文章》，《运城日报》2003 年第 14 期
- 马 兰：《运城盐池旅游资源概况及开发前景》，《运城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
- 刘清洋：《运城盐湖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矿产保护与利用》2001 年 6 期
- 王天齐：《南风集团—中国洗涤业的巨头》，《当代经济》2000 年第 9 期
- 张改枝：《南风集团发展的启示》，《山西财税》2003 年第 8 期
- 李光明：《盐业发展方向刍议》，《中国井矿盐》1999 年第 2 期
- 中国盐业总公司：《新中国盐业 50 年》，《中国盐业》2004 年第 2 期

- 徐柏年：《论制盐企业的生产管理》，《中国井矿盐》，2003年第5期
- 王乐义：《南风集团实施“中国死海”计划》，《南风周报》2001年第3期
- 吉成名：《运城盐池生产技术初探》（《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 张永朝：《运城盐湖主要资源及综合利用》，《矿业工程》第2卷第6期
- 乔当致：《运城盐湖硝板综合利用初步探讨》，《山西化工》第22卷第3期
- 程龙刚：《新中国盐业生产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2期
- 候明廷：《青海盐业—前进中的困惑》，《中国投资》2003年第9期
- 张荣生：《南通盐业史概》，《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和国忠：《云南盐业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矿井盐》2005年第31卷第3期

后 记

我是在盐池边长大的。听爷爷讲那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盐池传说、看父辈在盐池中忙忙碌碌的进行收硝作业、呼朋唤友在盐池边做那永远也做不完的游戏充满了我对童年的记忆。我爱我的家乡，我更爱伴随我长大的盐池。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想为她写点什么，可是每每拿起笔来，却又无从下手。

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岳琰教授。是她，当我第一次说出我的想法时，肯定了我的选题；是她，当我在写作中遇到困难时，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帮我理清思路。当然，导师的言传身教远远超出了这篇论文本身的价值，她给予我的帮助以及传授给我的为人、治学的道理将会永远伴随着我今后的求学和工作生涯。同时还要感谢李云峰教授、傅建成教授等多位老师，是他们夯实了我作学问的基础，对于他们的关照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笔者虽对运城盐池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对运城盐业的变迁这个选题也抱有浓厚兴趣且长久钻研，但由于学识有限，涉猎不广，因而本文难免出现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这篇文章尘埃落定了，一年来边天南海北的找工作、边复习考博、边准备论文的忙碌也告一段落了。感谢我的父母和爱人，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陪伴着我走过这段“艰难岁月”；感谢运城学院柴继光老师，是他的点拨和收藏的资料很大程度上成就了 my 的论文；感谢南风集团工会主席赵波，是他的热情帮助为本文资料的收集打开了方便之门。感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所有帮助过我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感谢他们，感谢生活。

杨彩丹

2006年5月